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贞观政要

【唐】吴兢 撰

王炳文 王晶 评注



华
人
生
智
慧
经
典

以观政要

【唐】吴兢 撰

王炳文 王晶 评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 / (唐)吴兢撰; 王炳文, 王晶评注. —北
京: 中华书局, 2014.8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ISBN 978 - 7 - 101- 10294 - 9

I . 贞… II . ①吴…②王…③王… III . ①典章制度 -
中国 - 唐代②《贞观政要》- 注释③《贞观政要》- 译文
IV . 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145576 号

书 名 贞观政要

撰 者 [唐]吴兢

评 注 者 王 晶 王炳文

丛 书 名 中华人生智慧经典

责任 编辑 王守青 王水涣

出版 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10×900 毫米 1/16

印张 12 1/4 插页 2 字数 19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10294 - 9

定 价 25.00 元

前 言

一、关于作者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左右，卒于玄宗天宝八载（749）。关于他的幼年生活我们不能详知，据《旧唐书》记载他年轻时即“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深得邻邑魏元忠和朱敬则的赞赏。但这也透露出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即吴兢没有获取过科举功名。长安（701—705）初年魏、朱两人相继为相，吴兢因史才出众得到荐举，进入中书省下设的史馆工作，参与编修本朝国史，并很快被授予右拾遗内供奉一职。右拾遗是中书省从八品上的低级职务，定额二人。内供奉属于编制以外人员，意思是在省内做事情，不过按照唐朝的规定，其资望、俸禄与编制内的正员官相同。对于吴兢这样没有功名、直接由举荐入仕的人来说，是很不错的待遇。

705年，桓彦范、敬晖等人联手禁军将领发动政变，将皇帝武则天赶下台，废周复唐，改元神龙，这一事件因而被称为“神龙革命”。吴兢在政变之后迁为右补阙，获得了中书省正式编制。他与韦承庆、崔融、刘知几等人共同修成《则天实录》，并因此被提拔为起居郎。这是门下省从六品的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起居活动，作为撰写实录的基本史料。大约在景龙元年（707）前后，吴兢

升任秘书省著作郎。次年,他的老上司、曾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的刘知几,因不满于当时的史馆体制而辞去修史工作,将之委任于吴兢。此后不久他被迁为水部郎中,这本是他由修史转向从政的一个机会,但恰在此时他的母亲不幸去世,吴兢于是丁忧还乡。开元三年丧服期满后,他谢绝了朝廷的相关任命,上书希望完成此前的修史工作。此后他虽历任谏议大夫、卫尉少卿、太子左庶子等职,但始终兼任修文馆学士。

长年的修史工作以及政见不同,使得吴兢在朝中人际关系多有不睦,加以《贞观政要》的进呈似乎引发了反对派的不同意见,于是吴兢在开元十七年(729)被调任地方担任荆州司马,一度在江南诸州任职,并得到朝廷特许“以史稿自随”。后来调到北方任相州长史、邺郡太守等职,晚年回到京师担任恒王傅,仍希望承担修史工作,但彼时的吴兢已经老迈,行动不便,因此时任宰相李林甫拒绝了这一请求。天宝八载(749)卒于家中,享年八十余。

从长安初年初入史馆算起,到开元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马为止,吴兢前后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将近三十年。如果加上此后外任期间以及晚年回京后的著述经历,则可以说吴兢一生几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史学工作。尽管著述宏富,但完整流传下来的仅《贞观政要》十卷。其史学专著见诸记载者包括《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五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唐书备阙记》十卷、《太宗勋使》一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睿宗实录》五卷、《兵家正史》九卷、《唐名臣奏》十卷,此外尚有参编史著及其他著述若干种,可惜全部散佚。不过需要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唐书》是五代人在唐代历朝实录及国史基础上纂修而成,其中高、武、中、睿四朝

历史，其实正是吴兢等当时史家著述的撷取和整理，甚至不排除大段的抄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兢留给后世的史学财富远不止一部《贞观政要》。吴兢修史崇尚精简，为世所称，但晚年著史过于强调精炼，以致信息不全、歧义频出，史称“兢卒后，其子进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旧唐书·吴兢传》）。

二、写作背景

对贞观政局的高度认可和推崇，是《贞观政要》编撰的基本立场。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年号，时间为公元627—649年，共计二十三年。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子，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享年五十二岁。他亲历隋末大乱，与父亲李渊共同起兵入关，并作为实际最高统帅平定了诸割据势力，与其说是高祖李渊的继承者，毋宁说是唐朝基业的创建者。唐太宗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政治上能够虚心纳谏，刑罚上务求宽俭公正，从而使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史称“贞观之治”。《旧唐书》编纂者认为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旧唐书·太宗纪》），是很公允的评价。在《贞观政要序》中，吴兢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代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宏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他将贞观政局盛赞为亘古未有，表现出高度的推崇

和追慕，希望通过贞观朝政教典模的编撰，为当朝和后世帝王树立典范，将这种政教之道弘扬光大。

武周时期严酷的政治气候，以及李唐复辟后政局的动荡，是作者撰写本书的直接动机。从垂拱元年(685)二月到神龙元年(705)正月，这段历史称为“武周时期”。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先后以太后和皇帝的身份，居于唐、周两个政权的最高统治地位。为巩固统治，武则天极力镇压李唐皇室宗亲和关陇旧贵族，着力提拔寒族士人，推行酷吏政治，鼓励告密，政治氛围高度紧张，这给青年时期的吴兢留下深刻印象。武周晚期，已入而立之年的吴兢进入史馆，先后参与了高宗、武后两朝的实录编修，并得以亲睹太宗朝大量史料。历览本朝百年政治变迁，使得吴兢对李唐复辟时期的政局产生深刻反省。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吴兢在中宗朝开始《贞观政要》的整理编撰，在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之前完稿。尽管杀青之时玄宗即位已近二十年，天下允称盛世，然而全书无处不在的现实关怀，则无疑源于武周晚期到玄宗登基这段时间里严峻的政治局面。

武周晚期以来的国史修撰群体为本书提供了思想基础。唐代的史学发达世所周知，这里面其实有很现实的政治因素。武则天上台后为加强皇权，培植了一个依存于中书、门下两省的庞大文士群体，作为政令制定、行政监督、思想宣传等方面的工具，而国史修撰正是其中之一。在武周晚期，史馆、修文馆这两省修史机构中逐渐汇集起包括徐坚、刘知几等在内的众多专业史学工作者。晚年刘知几曾回忆道：“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榷，得尽怀抱。”(《史通·自叙》)徐坚、刘知几年龄相仿，吴

兢则约小他们十岁，在初入史馆时受到了刘知几的关键提携，史称“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旧唐书·刘子玄传》）。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晋身迁转，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史修撰群体的治史思想对吴兢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贞观政要》体现出唐朝高水平史学著作所共有的直笔、精炼等优点。

三、主要内容

《贞观政要》将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间与各位大臣的对话、以及大臣重要的奏章，按照政治要素分为四十篇，每篇收录若干对话或奏章，从不同角度说明本篇主旨。大体来说，这四十篇是由宏观到细节、由内到外。第一卷有《君道》、《政体》两篇，从宏观上阐释太宗的为君之道和为政之体。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主要讲进谏的重要性。第三卷讲君臣关系、择官任人、封邦建国，属于国家治理范畴。第四卷从《太子诸王定分》到《规谏太子》，主要围绕训诫诸弟皇子展开。第五卷大致是关于臣子道德和义务的规定，包括仁义、诚信等准则。第六卷从俭约、谦让、仁恻等不同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贞观政治理念的细节层面。第七卷阐释礼乐学问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第八卷是关于农业、刑法、邦交等方面的内容。第九卷着眼于征伐安边，包括击突厥、征高丽这两次太宗朝最为重要的对外行动，并反映出太宗伟大的民族思想。第十卷则讲行幸、畋猎等戒惧之事，以《慎终》作为全书十卷四十篇的结尾，引人深思。要而言之，这部记录贞观朝君臣言语的史著反映出如下重要政治理念。

高度的君主责任感。与很多帝王不同，唐太宗具有高度的自我反省意识，对自己作为君主的责任有清醒认识。在与萧瑀讨论周、秦两

朝国祚长短悬殊的原因时，萧瑀认为“平定虽同，人情则异”，着眼于两朝末年天下形势的不同。太宗并不完全认同，他指出“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将国运盛衰的因由直接指向国君本身。（《辨兴亡》）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太宗才能时刻保持警惕。

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君主虚心纳谏，朝臣敢于犯颜。人们对贞观政局的认识往往较为片面，认为太宗善于纳谏，而进谏者则主要是魏徵，这种脸谱化的误解一定程度上源于各种文选、掌故对于魏徵的重视。事实上，贞观之治的形成不仅在于君主虚心纳谏，更在于有一个敢于犯颜直谏、与君主肝胆相照的朝臣群体，包括房玄龄、萧瑀、王珪、魏徵、岑文本、马周等众多唐初重臣。他们在年龄、资历上相差很大，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甚至掺有竞争的因素，但都能对太宗提出真诚意见，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重视百姓。全书开宗明义引用了太宗著名的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君道》）唐太宗明确批评了隋文帝防民甚于防贼的错误思想。他援引开皇旧事，指出隋文帝宁肯让“百姓逐粮”，也不愿开仓赈灾，以致失去民心。有鉴于此，太宗对《论语》中“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训诫深表赞同（《辨兴亡》）。这也正是魏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言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政体》）。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本书

虽然吴兢希望为玄宗治国提供镜鉴，然而《贞观政要》撰成之后并未引发当时朝野的广泛关注，也未被视为吴兢的主要著作。直到吴兢

去世半个世纪以后,致力中兴的宪宗李纯(778—820)才注意到这部著作的思想价值,常向朝臣提及自己所读心得(《玉海》卷四九)。文宗(809—840)自幼“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旧唐书·文宗纪》),即位后更是以之自勉。唐宣宗(810—859)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并能身体力行,使他获得了“小太宗”的美誉。尽管唐朝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但《贞观政要》却成为以后历代国君案头的必备典籍。本书在吴兢外孙蒋义的保存下得以传世,国内版本主要有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刊本和明成化元年(1465)戈直集论本两种。本书以四库全书本《贞观政要》为底本,参考了叶光大等《贞观政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骈宇骞《贞观政要》(中华书局 2011 年)两种成果。

《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计八万余字,其中不乏长篇奏议,文辞表述存在大量的敷陈排比、援引古典等现象,通读全书并非易事。我们从全书中精心选出约一万字的内容,大体每篇选出一至两则予以注释和翻译,并对选文进行延展性点评。选文的标准,尽量避免过长过繁的文字,以对话为主,简短明确,故事性强,并能集中反映该篇核心思想。注释的标准,主要针对选文中的重要人物、典故、地理以及与现代汉语用法明显不同的词语。译文以直译为主,兼及意译。需要指出,《贞观政要》是一部思想性的史著,读者读完选文本身就会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因此我们的点评没有局限于就选文谈感想,而是尽可能就其背后的历史事件、相关制度等深层因素予以阐释。如前所述,本书的撰写存在从太宗朝至武周这样一个无法分割的历史理路,本书点评在诠释贞观朝人事因由的同时,还以较多笔墨讲述了高宗、武后时

期的历史，包括相关史实、制度的考证，论证上务求严谨，叙述则尽量活泼，以期更加全面、完整地反映本书的思想背景，并使读者通过历史的参照与对比，对贞观政治有更为深刻和直观的理解。本书选文和评析由王炳文承担，注释、翻译部分由王晶承担。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王炳文

2014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001		
君道第一	001	诚信第十七	080
政体第二	006	俭约第十八	084
任贤第三	012	谦让第十九	089
求谏第四	017	仁惻第二十	092
纳谏第五	022	慎所好第二十一	095
君臣鉴戒第六	026	慎言语第二十二	099
择官第七	032	杜谗邪第二十三	104
封建第八	036	悔过第二十四	108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041	奢纵第二十五	111
尊敬师傅第十	045	贪鄙第二十六	114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051	崇儒学第二十七	121
规谏太子第十二	057	文史第二十八	126
仁义第十三	062	礼乐第二十九	129
忠义第十四	067	务农第三十	133
孝友第十五	071	刑法第三十一	136
公平第十六	075	赦令第三十二	141
		贡赋第三十三	144
		辨兴亡第三十四	147
			001

征伐第三十五	151	畋猎第三十八	167
安边第三十六	157	灾祥第三十九	172
行幸第三十七	163	慎终第四十	176

君道第一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之理^②，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③，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④，而侯景举兵向阙^⑤，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⑥，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⑦：“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⑧，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 “先人有言”二句：原作：“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出自《诗经·大雅·板》，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民”为“人”。全句意

为古人传下名言训导，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

- ② 唐、虞：即唐尧和虞舜，传说中上古圣明君主。理：治。古人将政令有序、天下太平的状态称为“治”，与“乱”相对。唐人为避高宗李治名讳而以“理”代称。《贞观政要》作于玄宗朝，因此避讳，事实上太宗与魏徵的对话不可能避“治”字讳。
- ③ 共、鲧：即共工和鲧，传说中上古恶人。共工以筑堤堵塞法治水不成，与颛顼相争不胜，怒触不周山，天地为之倾斜。另一说法是共工为舜帝设立的官职，主管工程筑堤和矿冶等事务。鲧是禹的父亲，用堵塞法治水失败，被杀于羽山，化为黄熊。部分学者认为共工即鲧，是一个人。
- ④ 朱异（483—549）：字彦和，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为文学侍臣，长期受梁武帝宠信，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虽富有才华而善阿谀奉承，侯景叛乱前他一直阻塞消息不让萧衍知道。侯景起兵以诛杀朱异为名，称其祸国害民，朱异忧惊发病而卒。
- ⑤ 侯景（503—552）：北齐高欢手下将领，为人反复残忍，先后投靠西魏及梁，发动兵变将梁武帝困死在台城，后被王僧辩、陈霸先击溃败死。
- ⑥ 虞世基（？—618）：南朝旧臣，入隋后受重用，对炀帝隐瞒天下起义实情，江都兵变中与炀帝一同被害。
- ⑦ 尚书左仆射（yè）：官名，尚书令的副职，有左右两名仆射。由于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书令，因此尚书令在唐前期基本空缺，尚书左、右仆射成为贞观朝实际最高行政长官。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唐初著名宰相，玄武门之变功臣之首，与杜如晦合称“房杜”。

(8) 践：踩到，引申为走向、导致。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怎样才称得上是圣明君主，怎样又算昏聩君主呢？”魏徵答道：“君王之所以圣明，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之所以昏聩，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老祖宗教诲我们要多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当初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求贤才，开阔视听，从而使得国君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巧言令色的小人也不能迷惑他。至于秦二世，则把自己藏于深宫，远离朝臣百姓，偏信赵高一人，等到天下分崩离析，自己还不知道。梁武帝专听朱异的话，结果侯景起兵直指朝廷都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义军攻克城池洗劫县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君王要能够听取各种意见，了解基层情况，这样权贵之臣就不会闭塞他的视听，而下面的情况也自然可以反映上去了。”太宗很认可他的回答。

贞观十年，太宗问各位侍臣道：“帝王的基业，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道：“天地秩序本来处于混沌无序，各路英雄竞相起兵，攻破城池敌人才肯投降，战胜对方才能获得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业要更难。”魏徵回答道：“帝王必然是应乱世而生，颠覆前朝昏暗统治，百姓一心拥戴，天下都来归附，既是天运授予，又是百姓拥护，没什么难的。可是得到政权以后，心志骄傲，渐喜安逸，老百姓想要过几天太平日子，结果却徭役征发不断，民力早已不堪，大役却接连不断，国家的衰败弊政，基本都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着我平定天下，历尽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了创业的艰辛。魏徵辅佐我治理天下，担心产生骄傲安逸的端倪，而走向危亡境地，因此看到了守成的困难。现在

创业的困难已经过去,至于守成之难,我要和你们共同警惕啊!”

【评析】

我们今天将李渊称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个观念在唐前期并不是很清晰。当时从朝廷到民间,更为追慕的其实是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并倾向于将李世民定为开国皇帝。所以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诗圣杜甫还要无比向往地写下“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诗句。贞观一朝与其说是政权继承,毋宁说是制度初创,这也使得唐太宗比此前任何帝王都更为重视“君道”。所谓君道,就是为君之道,换句话讲,即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帝王。在君天下的时代,优秀的皇帝可以缔造盛世强国,而昏庸者却足以断送江山祖业。唐太宗关于为君之道的认识,成为唐代以后历任君主遵行不替的准则。太宗少年起兵征战四方,即位后又能虚心纳谏志于守业,这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高度的政治使命、严格的自我要求都有关系。虽然他在晚年也表现出好大喜功等特点,但总的来说,他的一生是勤于政治奋发图强的,无愧于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

《左传》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统治者处理问题必须持中庸之道,切忌意气用事。这里讲一个发生在太宗朝的故事。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百官披麻戴孝参加追悼大会。其实这种大型宫廷活动也是官员彼此交流的一种途径,因为一些致仕的官员平日里并不一定经常露面。哀乐声中百官依次入场,当时的太子率更令、年届七旬的欧阳询也出现在人群中。欧阳询在唐初是绝对的大人物,他官阶不高但资历很老,是高祖李渊的老朋友。欧体字笔力险劲,允成一家,不仅盛誉当时,更流传千古,武德年间曾有高丽使者专门入朝求欧阳询的字。据说当时高祖感慨道:“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